

從葛洪一生的際遇探討其入世與出世思想

彭慧嫻

中華佛學研究

第四期 (2000.03)

頁 169-186

頁 169

提要

葛洪為魏晉時期道教主要的代表人物。葛洪生在儒、道世家，年幼喪父，多次遭遇兵火戰亂仍奮發自學。後拜師學五經、神仙導養之術等知識，並立志著一子書，令後世知其為文儒，但又慕仰歸隱之士。其一生為官數次，卻大都只是諮詢性質的小官。由於葛洪經歷了兩晉、八個君王的更迭，政治腐敗、仕族萎靡以及無數的宮廷鬥爭與內戰，加上其性格之不好附會、奉迎，堅持不肯隨波逐流等因素，形成其刑以輔德、君王修德、尚賢任能等的政治理想。這點從其代表作《抱朴子》外篇中即

可明顯得知。另外，當時社會亦崇尚道教養生之術，從葛洪一生中常入山歸隱修道的行為，乃至晚年選擇以修煉養生終了一生，又可發現其人生的理想。

入世與出世思想在葛洪身上皆可感受得到，但一般學者大多把他視為道家人物。本文擬從葛洪的家世背景、時代背景及其一生的際遇中，探討在這一環境中，葛洪之入世與出世思想形成的原因、內容與特色。進而發現，雖然葛洪以「身入世而心出世」為修道的最高境界，也以其一生嘗試去實現此一理想，但最後卻選擇歸隱山林的出世行為，而捨棄世間的治世理想，其實是與其身處魏晉時期，整個大環境的限制密切相關。

關鍵詞：1.葛洪 2.《抱朴子》 3.入世 4.出世 5.道教 6.魏晉南北朝 7.鄭隱 8.鮑靚 9.治世 10.修道

頁 170

一、前言

自古以來，人類一直希望建立一個和諧美滿、理想正義的生存社會，並努力提出改善社會的因應之道，尤其是知識份子，更是窮盡一生思索、反省並批判社會的現象，提出各種可能的意見與方法，也努力地去實踐之。然而，當社會已處在極度腐敗、混亂，而且這種現象竟已成為一種風尚時，知識份子在對時局的欲振乏力的極度失望與無助下，大多會消極的隱遁山林、超然修道或清談玄義、不問世事以度餘生。這種入世與出世的思想觀念的形成顯然與環境的變遷有關，而且二者似乎截然劃分、互不相攝，成為不是積極入世就是消極出世的兩種不同的選擇。

東漢自桓靈以後，在宦官、外戚輪值當政下，黨錮之禍頻生，累及士子，使得許多讀書人諱言政治，深感儒學不能予以安身立命的憑藉，而棄儒崇道。到了魏晉時期，更是中國社會由短暫統一又走向分裂的時代，也是社會最動盪、政治最黑暗、民族災難最深重的時期之一。當時的人生觀約略可分為三派：[\[1\]](#) 一是要求順情通性，得到自由自在的滿足的逍遙論，如向秀、郭象的莊子注；一是要求調情感、除物誘、排智巧以期終老天年的養生論，如嵇康的養生論與答難養生論；一是求肆情縱慾，以享受人生的縱慾論，如列子楊篇。

葛洪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進入社會、參與政治活動，乃至最後隱遁山林渡餘生，加上他的家庭背景與教育環境的熏陶，使他一方面有抱

朴守質、淡泊名利的個性，篤志神仙之學的出世思想；另一方面又重視禮節與道德，甚至提倡德行與性命雙修，強調修德是求仙的重要途徑，以此來匡正流俗萎靡的弊病，更提出了各種為政之道，希望藉以對治當時的腐敗之風的入世思想。

入世與出世的思想在葛洪身上皆可以感受得到，但一般學者大多把他視為好神仙之學的道家人物，甚少視為儒者。令筆者好奇的是：造成

頁 171

葛洪具有這兩種不同的思想特質真正的原因為何？是積極的世間關懷（入世），還是只是一種對世俗不滿的批判？是積極的人生追求（成仙），還是消極的對世間的絕望與放棄下唯一的選擇（出世）？因此，筆者欲從葛洪的一生際遇中探討其入世與出世思想的特質與關聯性，希望能藉此深入葛洪的思想內涵，進一步了解其在入世與出世的選擇上的分化與融合關鍵之處。

二、葛洪生平簡述

(一)葛洪的家世背景

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朴子，晉丹陽郡句容縣人（今屬江蘇省）。出生約晉武帝太康 4 年(283)，卒約建元元年(343)，享年六十一。^[2] 葛洪生於江南著名的士族家庭，祖輩世代為官。

洪祖父葛系（一作奚）曾仕吳，歷任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宰，入為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等要職。^[3] 如《抱朴子·外篇·自敘》中言：

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之才。^[4]

其從祖葛玄，字孝元，好神仙修煉之術，學通古今，博覽經傳子史，好彈琴、誦老莊、懂醫術，常行奇技仙術於世，有神驗。有弟子三

頁 172

百餘人，鄭隱為其入室弟子之一。吳人稱之為「葛仙公」或「太極左仙翁」。^[5]

葛洪之父葛悌，「以孝友聞，行為世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6]

仕吳，歷任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等職。入晉後，歷位大中正、肥鄉令、遷邵陵太守，卒於官。為官清正，廉潔無私，「舉州最治，德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7] 因此，從其祖父至其父之事跡可知，除了葛玄外餘者均好儒學，且在仕途上皆有顯赫之跡。

(二)葛洪的時代背景

魏晉時期，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特色。首先在經濟上出現了士族豪強領主經濟，江南兼併之風更盛，大批農民流為士族豪強的佃客和部曲。《宋書·武帝本紀》：

晉自中興以來，治綱大弛；權門兼併，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產業。

隨著士族豪強社會勢力的強大，皇帝也與士族豪強們相競爭與妥協，形成社會上的腐敗之風。^[8]

在文化風尚方面，漢之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自漢末以來已名不副實，^[9] 弊端叢生，出現了「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

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10] 的局面。選舉官吏的權力都被宦官、外戚、士族和朋黨把持，儒家失去了維繫人心的力量。因此，到了魏晉時期，清談之風興起，形成以玄學為代表的士族文化；也有對當時傳來的佛教文化和道教方術產生興趣的，而不再走漢代「純儒」、「經師」的路，形成了中國文化史上儒、釋、道三教鼎立的局面。^[11]

葛洪所處的時代，政治的崩壞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君王昏庸，大臣橫暴，上下驕奢，朝綱不振，君臣倫理的原則幾乎全部被破壞。葛洪從出生到卒世期間，經歷了兩晉、八個君王的更迭，以及無數的宮廷鬥爭與內戰。^[12] 這一世態的迅速變化，對其一生的影響應是不小的。

魏晉時，士族操縱朝廷用人之權，官位高卑皆視家族的背景，有權勢的門閥士族和依附他們的門生故吏私為君臣。當時國家不斷發生易君禪代的政治變亂，而士族的社會地位卻不變，仍享有許多政治特權。實際上，魏晉社會就是漢末腐朽社會的延續，尤其是兩晉之際。^[13]

晉代以後，養生服藥的人遍及社會各個階層，神仙道教在上層士族社會中更是傳播迅速。當時道教在魏晉社會的發展特徵，據胡孚琛的分析有四點：一是道教的組織渙散，無統一的領導。二是天師道較具代表性

且擴展到上層士族。三是早期道教產生分化和上層神仙道教逐步形成。四是道教發展的重要的過渡期，葛洪正處道教的過渡期，加上祖、父輩為儒官，從祖好神仙之學的家世淵源，故其兼收二家之精要，並為道教哲學作了關鍵性的貢獻。[\[14\]](#)

(三)葛洪的一生際遇

《抱朴子·外篇·自敘》中葛洪將自己的一生交待得非常詳細，而

頁 174

學者們也作了許多的考證與論述，[\[15\]](#) 本文茲引用陳飛龍教授一篇考證極為詳究的文章：《葛洪年譜》，[\[16\]](#) 作為以下敘述的主要依據，並從葛洪的成長歷程、學習歷程、為官過程及歸隱山林等四方面作介紹。[\[17\]](#)

葛洪的成長歷程可從晉武帝太康 4 年(283)到惠帝太安元年(302)，計二十年的歲月中去了解。《抱朴子·外篇·自敘》云：

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為二親所嬌，不早見督以書史。[\[18\]](#)

又云：

洪體鈍性驚，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髻，又擲瓦手博，不及兒童之群。未曾鬥雞驚，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自眇。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有若晝睡。[\[19\]](#)

由是見之，葛洪的童年生活應是受寵而不甚好讀書的，又自認為性情愚鈍內向，手腳不靈活，不好與同伴玩。

葛洪十三歲父亡，故其生活與學習歷程遂陷於饑寒困頓之境，不得已而躬執耕稼。又多次遭遇兵火戰亂，先輩傳下的書籍蕩然無存。「乃負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代薪賣之，以給紙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20\]](#) 足見在父亡後其獨立而艱辛的自學奮發的歷程，只是此時沒有就教的對象，而自認「貧乏無以遠尋師

頁 175

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21\]](#)

據陳氏考證，葛洪當於十五歲時拜鄭隱為師，學神仙導養之術。鄭隱明五經，知仙道等天文知識。至二十歲這五年間，洪兼學儒道，一心兩用，致有「意志不專」之嘆。時始作詩、賦、雜文，自以為甚佳，欲精治五經，著一子書，令後世知其文儒，且無意於仕途，故每覽名人歸隱之傳，常仰慕其人而心嚮往之。此時也因欲鍛鍊身體、禦寇避劫、獵取鳥獸而習武，這點對其以後的際遇亦頗具助益。

二十歲以前的葛洪，徘徊於儒、道之間，為求學、習作的階段，更為以後的創作與方向奠下了很好的基礎。

葛洪一生中為官數次，首次即在二十一歲時任將兵都尉，大破石冰之軍，又被封為伏波將軍。^[22] 石冰事平，洪投戈釋甲，欲徑詣洛陽，欲廣尋異書，以廣見聞，但受到戰亂所阻。^[23] 欲返故里，又因陳敏據江東作亂而致周旋於徐、豫、荆、襄、江、廣數州之間。二十四歲時，因廣州友人嵇含上表推薦洪為參軍。洪至廣州未幾，嵇含即遭人暗殺而亡，致洪滯留廣州數年，絕意仕途，屢檄不就。

晉懷帝永嘉 6 年，葛洪三十歲隱居羅浮山，始與南海太守鮑靚相善，拜靚為師，受石室三皇文，且娶其女為妻。三十二歲返故里，閑居，州郡及車騎大將軍禮辟，皆不就。^[24] 後一年，勉受辟為府掾。^[25] 又二年，受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洪上書固辭但未見許。

考葛洪於十六歲已立志撰一子書；二十歲著手草創；至三十五歲始撰成《抱朴子》一書。至其四十五歲時，洪因生活所迫，逢王導召其為補州主簿(史官)，洪乃受職不辭。旋轉司徒掾，又遷諮議參軍，皆屬「顧問」「諮議」性質。此應為洪最後一次為官，因其至六十一歲終了

頁 176

於一切職皆辭不就。[\[26\]](#)

葛洪素有隱居山林之志，《抱朴子·外篇·自敘》有言：

自度性懶而才短。以篤懶而御才短，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辨，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亡己，不由於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非絕棄世務，則曷緣修習玄靜哉？……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違遠謹譁，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27\]](#)

迨郭文死時，因敬仰其人有「未卜先知」之術，而為其作傳贊頌之餘，慨嘆人生無常，因而有隱居蘭風山，從事修道之舉。[\[28\]](#) 洪五十歲時，

聞交趾產丹，請為句漏令。至廣州，為刺史鄧嶽強留，乃止於羅浮山，從事煉丹。其在山數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

晉康帝建元元年，一日，洪予廣州刺史鄧嶽書，云：「當遠行尋師、藥，剋期便發。」嶽得書，心知有異，往見之，而洪已亡，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入棺，輕如空衣，時咸以為屍解得仙也。

(四)小結—葛洪的人格特質

從葛洪的一生際遇中可以發現其特有的人格特質，而這種人格特質往往不是單一因素所造成的，其中包括了其本身的性格、成長的環境、學習的內容、人生的際遇等等錯綜複雜的因素。今就以上所言，略作分析如下：

葛洪自小性格內向，在語言和交際上也顯得木訥寡言，使其在長大後變得內斂沉著，遇事喜歡獨立思考，也較有自己的見解，在社會活動中也堅持不肯隨波逐流。在《抱朴子·外篇·自敘》有言：

洪之為人也，而駸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覆垢弊，衣或襤褸，而或不恥焉。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為抱朴之士。[\[29\]](#)

在待人處世上，由於其「抱朴」之個性，故不會主動拜訪長官，也不計毀譽。結交朋友也在審慎觀察，詳細了解後才往來。因是之故，非常討厭淺近之人，「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彼所不聞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度不可與言者，雖或有問，常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30\]](#)

其亦痛恨邪惡不義之人，也具有口不論人是非、不妄意評價人物的性格，認為「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況非我，安可為取而評定之耶！」

由於有這樣的個性，因此對於世俗的萎靡作風及政治的腐敗甚為不滿，常有所批評及有自己的看法，倡「道內以治身，外以為國」、「道本儒末」的思想；但他受儒學漬染頗深，故其修持是以道為法，治世則以儒為本的。

又，葛洪認為富貴只可以逐漸獲得，而不能立即便得到，且當富貴離開時也挽留不住，「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不喜，失之安悲？」^[31] 「樂天知命，何憂何慮？安時處順，何怨何尤？」^[32] 「禍莫大於無足，福莫厚乎知止。」^[33] 這種安貧知足的人生態度，乃至最後隱遁山林，筆者認為應是在見識與經歷了許多變故後，內心經過一番的掙扎和調整而漸漸形成的。

頁 178

王明在《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一文中曾對葛洪的思想作以下結論：
葛洪這個飄零沒落的士族分子，他的前後思想變遷的脈絡，大體就是從入世而遁世，從儒家而至皈依神仙道教。但也始終沒有忘懷儒家和道。這是與他的階級出身、所處時代和個人遭遇息息相關的。^[34]

葛洪的人格特質是獨特而多面的，從其人生際遇與思想變遷來看，既有知識份子的積極關心社會動脈的入世精神；又有因社會的過度動亂與腐敗，以及因自己的建樹沒有機會發揮，進而選擇隱遁山林，不再為官

問世事的消極心理。因此，葛洪的一生，其實是魏晉時期，知識份子面對與經歷了社會的變化萬千的心歷路程的明顯寫照。[\[35\]](#)

三、葛洪入世與出世思想

(一)思想形成的因素

人在現世的生命活動，往往與其所處的環境息息相關，而在參與的過程中也會有自己的「世間哲學」；但人的生命活動不只限於現世中，人亦有超現世的嚮往，即是人的出世的生命活動表現。[\[36\]](#) 葛洪在這兩方面的思想，可從其代表著作《抱朴子》之外篇中明顯的看出來。

「葛洪的抱朴、保守性格具現於外篇，就是延續並轉化漢人舊學，其中含攝儒、墨、道、法、兵諸家，而歸本於儒家，他以之論人間的得失、世事的臧否，常因應時勢，因事制宜。所以論出處去就之道，適應

魏晉多故的政局，多倡逍遙隱遯，知止任命的道家思想；論君道臣節之道，感於晉世紛亂的政治，提倡君尊臣卑之說，君主修德，又能分官任賢，則權臣不再跋扈、能臣能有出身，近於外法內儒的思想。論譏俗救生之法，激於魏晉士風的頹廢，因而主張嚴刑峻法的法家與省煩去侈的墨家，而反對俗儒的仁政、道家的迂闊。」^[37]

依李氏之見，只是外篇就含攝了不只一家之言，大抵因其生處兩晉之交，有感於權臣的跋扈和君勢的微弱是致亂的主因，故也主張法家的刑以輔德之說。同時也含蓋了入世與出世的思想，這與葛洪身處魏晉時期儒道的合同、離異交雜的時代因素密切相關。

如前所言，魏晉之際，世變紛紜，又逢北方大族南下，紛據要津，形成新的政治集團，使南方舊族沒落。葛洪出生南方士族世家，受儒學的浸濡頗深，因此對北方士族的放蕩、好變、奢華極為厭惡，故其在外篇中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以維護禮教的理由予以痛斥。因此，時代環境的更迭、多變成為其入世與出世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一。

據林氏的分析，葛洪在十五歲從鄭隱習道時，由於同時兼學經書，一心兩用，意志不專，以致績效不佳；既不能為純儒，又無法證道，故在為官的過程中，內心經歷了一番矛盾與掙扎。加上又經歷了石冰之亂、八王之亂、陳敏之亂、永嘉之亂等變故，因而對自己身世的多難及友人

嵇含的突遭暗殺深為感慨，認為富貴如華，難以長存，而寧可選擇寄情於山林、修道以養天年。^[38] 此為其思想轉折之二。

另外，師友對他的影響也不小。首先跟隨鄭隱學道，雖自言所學不專，也沒有隨之歸隱，但因博覽儒道二書，所以也為其將來的思想與著述奠下了深厚的基礎。鮑氏則是葛洪在仕途游盪多年後，主動向之學習的，當時的葛洪已從仕途趨向歸隱絕仕之路了。再者郭文的「未卜先知」而亡，遂令洪羨慕其學道有成，而更刺激了他入山林專志神仙之學的心情。這一切皆對葛洪產生頗大的影響，令其在見仕途無所可為之

頁 180

下，修道成仙成了他晚年認為唯一可以做、可能實現的理想，尤其在「生命之有限、人間榮華如朝露」的人生感慨下，覺得尋找一個精神的寄託，才是唯一可以慰藉心靈的方式。此為思想轉變之三。

綜觀葛洪從對社會政治及風尚等的積極關注、治世理想的提出，漸漸走向歸隱山林修道之過程及轉變，雖稍能理解或分析出一部份的原因，但這畢竟是複雜而深刻的心路歷程，實非外人所能盡見的。唯筆者從其

一生的際遇與轉變中，發現環境對葛洪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葛洪最終選擇隱遁山林修道，或許如其所言的好神仙之學所致，但如果在環境許可下，足以讓他發揮自己所規劃的治世理想，宣揚其入世之哲學理念，那他又將會對入世與出世作何抉擇與取捨呢？還會一本初衷地以出世為唯一的選擇嗎？選擇修道成仙也就可能並不只是實現人生理想那般單純了。

(二)思想內容與特色

1.在政治及社會風俗文化上

魏晉時代，上層道教的社會政治屬性越來越強，葛洪是這個時期神仙道教代表性的人物，但他除了能接受有黃老道家淵源的養生論外，對士族名士的逍遙和縱慾兩派都有所批評，提出以道為本的思想。他一方面推崇隱逸思想，鼓勵知識份子脫離朝政，鼓吹神仙道教，他的代表著作《抱朴子內篇》更奠定了神仙道教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又主張山林中的隱士可以「論世務」、「議政事」。《抱朴子·外篇》即是此一思想的代表著作。[\[39\]](#)

外篇多為入世思想，對魏晉的禪讓廢立的政權交替方式大加申斥。《抱朴子·外篇·良規》有言：

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退王，惡其可乎？……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

頁 181

改，父亦可易也。[\[40\]](#)

故其認為只有先鞏固君權，確立君威，方能平息亂臣的跋扈與僭越。但，又提出君王必須修德、尚賢任能，任賢時須量才為用；也提出了若干察舉的原則和方法，並以刑輔德等等的政理想，[\[41\]](#) 表達了他力圖割除時弊，挽救政局的願望。

在社會風俗文化方面，葛洪一方面主張禮法省煩，以改禮學家煩瑣之弊；但一方面又強調禮數，以改玄學家的放誕之習。提酒誡，明學問與教化的重要，企圖以此挽救世俗的流弊，想以漢儒治學的精神及自己的新文學來變革傳統觀念。[\[42\]](#)

綜觀以上之思想內容，葛洪的政治等主張兼用了儒、道、法等的治世思想，是相當的積極、入世的，也頗能展現其為儒學世家的魄力與精神，一改過去修道者不問世事之態度，強調了隱士也要關心時局的觀念。

2.個人修養方面

在個人修養上，葛洪也不是「純儒」或「純道」的，而是主張儒道兼修。在《抱朴子·內篇·釋滯》言：

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輕舉者，上士也。自才力不能並成，則棄智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也。[\[43\]](#)

又《抱朴子·內篇·微旨》言：

頁 182

欲求長生者，必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44\]](#)

《抱朴子·內篇·對俗》又言：

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得長生也。[\[45\]](#)

由上觀之，葛洪的修道是以儒輔道的，且若無修德的功夫是修不成仙的。至於他的道的境界，依林氏言，「承襲老莊的宇宙觀，以道—或其作用的神秘而稱之為『玄』—為宇宙的本體，凡人修道體玄之後，不止能使精神長王，而且形體不衰，可達『長生久視』的神人境界，出乎無上，入乎無下，遨遊天地之間，逍遙恍惚之中，為人生慾求的最高滿足和享受。」[\[46\]](#)

葛洪之所以想到達這樣的境界，乃源於其對生命苦短的人生態度：

百年之壽，三萬餘奪，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蒙昏除數十年，而險益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平和，則不過五六十年。……六七千日耳。顧眄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也！[\[47\]](#)

因是之故，葛洪嚮往神仙的長生不老的境界，而建立出一套的神仙哲學的隱逸修道出世思想，並提出了稟賦、立志、明師、勤求以及積善修德等的修道條件用以實踐其神仙理想。[\[48\]](#)

綜觀葛洪的出世修道思想，固然其明顯的是承襲了道教養生成仙的觀念。另一方面，讓他真正完全的捨棄世間的一切，全心投入修道煉丹的原因，仍可從其一生的際遇變化中感受得到，特別是其在仕途及人生際遇上的不盡如意，內心對世間的紊亂深感欲振乏力之下，所產生出來的無力感與幻滅感下的選擇。因此，筆者認為：葛洪的隱逸出世思想應是在被動、無奈、消極的時空環境下形成的，而且是魏晉時期，知識份子在那樣的大洪流下，無法避免的命運。

(三)綜述

「人性」本身就橫跨了「身」「心」二界，「入世」與「出世」的思想是可以視為「身入世心出世」的。二者之間可以是衝突，也可以是調合無礙的。^[49] 但人畢竟是生活在大環境中，生活的智慧是靠生命長期的歷練與長期的如理思惟而得的，能做到「身入世而心出世」，且能在其中悠遊自在無所罣礙，其實不是一般人所能為的。

回顧葛洪的一生，從其父亡至其終老，較長的時間是在出世與入世間徘徊的。縱然其一再強調為官是迫不得已、非其本志，然其內外篇字裡行間也一再透露出不滿時事、對世事有所建言之態；再看其官職，除了首次為官的將兵都尉外，餘者多為「諮議」「顧問」性質的無實權的小官，根本無法發揮其為政處事之理想。這對於一個儒學世家，以著一部子書立名後世的知識份子而言，其內心那種欲入世奉獻心力卻生不逢時的煎熬與掙扎是不小的。乃至最後一再親眼見到世間的頹廢與腐敗，內心那股欲出仕提振風尚的熱情是會一再被澆熄的。因此，其晚年選擇以隱遁山林、不問世事、專心煉丹的生活方式，並且傳其「預知時至」的化仙而去的結束不甚如意的一生，這樣的結局似乎也是順於時勢及其性情的。

頁 184

四、結語

葛洪生在儒學世家，祖輩世代為官，自小受到儒學思想的熏習，雖自言少受督勤學經書，卻多少受到其父為官清廉無私的影響，而對為官者

的要求及當政者的祈望與建議，多採儒家等諸家的治世之道。又其一生遭逢多劫災難，顛沛流離於數州之間，親見社會風尚之頹糜與腐敗，加上仕途之不順心及故友之變等際遇，促其治世思想漸趨淡薄，轉而專志於其一直以來所嚮往的神仙修道思想。

葛洪努力了一生，著述了《抱朴子》內、外篇以表其治身與治世之道，但終究抵不過大環境的洪流，無法真正做到其認為修道的最高境界——「身入世而心出世」。中國社會的知識份子多受儒家影響，強調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然而世事多變難料，若生不逢時，再大的理想也抵不過環境的大洪流。知識份子除消極的遁世或隨波逐流，少有能做到「身入世而心出世」的超然態度。縱然如葛洪般努力一生，並著書以明志，終也只被視作道學之重要人物，而少言其治世之理念，使其求以「文儒」留名後世的願望終難實現。

從葛洪早期立志著書與接受官職的事實來看，他對世間的關懷曾經是積極的。然而在經過了中年的流離生涯後，由於親眼見到、接觸到仕族子弟的萎靡奢濫，以及政治生態的無可救藥，又因沒有機會參與政事，內心那股對世俗不滿的情緒，使其對世間從積極的關懷轉變為消極的絕望與放棄，最終選擇走入山林，終了一生。其入世與出世思想的分化原因，除了是性情上不合於世之外，整個魏晉時期的大環境，其實是主要

而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也是當時大多數的知識份子所難以避免的命運。

【參考文獻】

一、書籍資料

1. 晉葛洪著，天道館主編校，《抱朴子》，臺中：創譯出版社，1981年6月。
2. 《晉書》卷72〈葛洪傳〉。
3. 侯外廬主編，《中國思想通史》第三卷—魏晉南北朝思想，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5月。
4. 王仲犛著，《魏晉南北朝史》下冊，上海：人民出版，1980年12月。
5. 李豐楙著，《不死的探求—抱朴子》，臺北：中時出版社，1982年12月。
6. 湯一介著，《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道教》，臺北：東大出版社，1988。
7. 任繼愈主編，《中國哲學發展史—魏晉南北朝》，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

8. 胡孚琛著，《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9. 馮達文著，《回歸自然—道家的主調與變奏》，廣東：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7月。
10. 寧稼雨著，《魏晉風度》，北京：東方出版社，1992年9月。
11. 劉精誠著，《中國道教史》，臺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7月。
12. 李中華注釋，《新譯抱朴子》，臺北：三民書局，1996。
13. 王利器著，《葛洪論》，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7。
14. 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卷1，臺北：中華道統出版社，1997。
15. 《中國道教大辭典》，臺北：東久企業有限公司，1996年7月。
16. 《中華文化百科全書》冊1，黎明文化事業公司、中華文化基金會印行，1989年10月。

二、期刊論文資料

1. 林麗雪著，〈葛洪事蹟與著述考—葛洪研究之一〉，《國立編譯館館刊》6:2，1977。

2. 林麗雪著，〈抱朴子內篇思想析論—葛洪研究之二〉，《國立編譯館館刊》7:2，1978。
3. 林麗雪著，〈抱朴子外篇思想析論—葛洪研究之三〉，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文史哲學報》第28期，1979。
4. 陳飛龍著，〈葛洪年譜〉，《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41期，1980。
5. 王宗昱著，〈評葛洪論儒道關係〉，《孔孟月刊》31:5，1993。
6. 王淳美著，〈魏晉之政治思想〉，《南臺工商專校學報》第20期，1994。
7. 陳飛龍著，〈抱朴子修撰過程考論〉，《中央大學社會文化學報》第1期，1994年5月。
8. 李軍著，〈玄儒佛道教育哲學比較研究〉，《孔孟學報》第70期，1995年9月。
9. 詹哲裕著，〈漢末魏晉時期老莊學說對儒家禮法思想的衝擊〉，《復興崗學報》57期，1996年6月。
10. 李杜著，〈從哲學的了解去說宗教的入世說與出世說〉，《哲學與文化》23:7，1996年7月。

11. 巨克毅著，〈論宗教的入世精神與社會正義〉，《宗教哲學》2:3，1996年7月。
12. 鄔昆如著，〈入世與出世的衝突與調和〉，《宗教哲學》2:4，1996年10月。
13. 李剛著，〈漢魏兩晉道教生命哲學的發生形成〉，《宗教哲學》2:4，1996年10月。
14. 李軍著，〈中國宗教教史上的一座豐碑——葛洪《抱朴子》道教教育理論探析〉，《哲學與文化》24:2，1997年2月。
15. 呂武志著，〈《文心雕龍》與《抱朴子》文論〉，國立師範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報》43(1)，1998。
16. 饒宗頤著，〈審慎精細博洽——評楊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箋》〉，《明報月刊》，1998年5月。

註釋：

^[1] 參考林麗雪著〈抱朴子內篇思想析論——葛洪研究之二〉，臺北：《國立編譯館館刊》7:2，1978年，頁40。

[2] 關於葛洪的生卒年有各種說法，可參考陳飛龍著的〈葛洪年譜〉《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41 期，1980 年）、胡孚琛著的《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之附錄〈葛洪年譜略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錢穆著的〈葛洪年譜〉（《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冊 3，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77 年）等，此採陳飛龍之看法。

[3] 參考葛洪著《抱朴子》，天道館主編校，臺中：創譯出版社，1981 年 6 月，頁 265。

[4] 同上注。

[5] 見胡孚琛著《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頁 78。

[6] 同注 3。

[7] 同注 3。

[8] 同注 5，頁 36 ~ 37。

[9] 參考林麗雪著〈抱朴子內篇思想析論——葛洪研究之二〉。據作者分析，儒學的衰微有內外因素：內在的因素是指儒學思想的墮落和經學的支離破碎；外在的因素則為政治的紊亂和民生的疾苦。詳見頁 39 ~ 40。

[10] 見葛洪著《抱朴子·外篇·審舉》，頁 171。

[11] 參胡孚琛著《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頁 37～38。

[12] 見王仲犛著《魏晉南北朝史·魏晉南北朝大事年表》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年 12 月，頁 1058～1060。

[13] 同胡孚琛著《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頁 39～40。

[14] 詳析參見胡孚琛著《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頁 46～47。

[15] 如注 2。

[16] 陳飛龍著〈葛洪年譜〉，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41 期，1970 年，頁 149～182。

[17] 略為參考李豐楙著《不死的探求—抱朴子》內的分類方式，臺北：中時出版社，1982 年 12 月，頁 29～52。

[18] 《抱朴子》，頁 265。

[19] 《抱朴子》，頁 270。

[20] 《抱朴子》，頁 265。

[21] 《抱朴子》，頁 266。

[22] 葛洪本不欲為官，此次則以「既桑梓恐虞，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之義」；又以「畏軍法，不敢任志」之由勉強為之。

[23] 時值八王之亂未平，四處皆為亂事，道路受阻不得前進。

[24] 《晉書》卷 72 之葛洪傳：「後還鄉里，禮辟皆不就。」

[25] 時司馬睿大事招延人才，多辟掾屬。「掾」，屬「顧問」、「咨議」性質的官職。

[26] 可參見《晉書》卷 72〈葛洪傳〉、《太平御覽》卷 664．〈晉中興書〉所敘。

[27] 《抱朴子》，頁 269～270。

[28] 此事晉書未記載，據陳氏考證為實，參注 16，頁 174～175。

[29] 見《抱朴子》，頁 266。

[30] 見《抱朴子》，頁 267。

[31] 見《抱朴子》，頁 269。

[32] 見《抱朴子．外篇．名實》，頁 269。

[33] 見《抱朴子．外篇．知止》，頁 260。

[34] 本段因無法找到確切的出處，故引自胡氏（注 5，頁 96）之引文。

[35] 關於葛洪的心理與人格特質，胡氏的著述（注 5，頁 82～99）中分析得甚為詳細，值得參考。

[36] 參考李杜著〈從哲學的了解去說宗教的入世說與出世說〉，《哲學與文化》23：7，1996 年 7 月，頁 1764～1765。

[37] 引李豐楙著《不死的探求——抱朴子》，臺北：中時出版社，1982 年 12 月，頁 111。

[38] 同注 1，頁 41。

[39] 參考詹哲裕著〈漢末魏晉時期老莊學說對儒家禮法思想的衝擊〉，《復興崗學報》第 57 期，1996 年 6 月，頁 134。

[40] 見《抱朴子》，頁 160。

[41] 詳細內容可參考：林麗雪著〈抱朴子外篇思想析論——葛洪研究之三〉，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文史哲學報》28 期，1979 年。

[42] 可從《抱朴子·外篇》之疾謬、譏惑、名實、清鑒、行品、酒誡、弭訟、勗學、崇教、博喻等篇中得知此一理想。

[43] 見《抱朴子》，頁 42。

[44] 見《抱朴子》，頁 35。

[45] 見《抱朴子》，頁 15。

[46] 同注 1，頁 66。

[47] 《抱朴子·內篇·勤求》，頁 79。

[48] 詳細內容可參考注 1，頁 51~56。

[49] 參考鄔昆如著〈入世與出世的衝突與調和〉，《宗教哲學》2：4，
1996 年 10 月，頁 65。